

中國共產黨為甚麼 放棄新民主主義？

• 高王凌

「新民主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提出的一個建國理論，曾得到各界人士的擁戴和黨員幹部的認同，對他們來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是很遙遠的事，將「新民主主義」設定為建國目標也就順理成章^①。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權之際就明確提出要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時間是十五至二三十年。但不過幾年的光景，毛澤東就在1953年改口說，新民主主義階段只是一個「過渡時期」^②。隨後，中共在二三年時間裏就推動了「三大改造」，即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新民主主義」的棄取遂成為一件歷史公案，牽涉問題極為廣泛。對這一歷史事件究竟該如何解釋，始終眾說紛紜，從「權謀論」到「延長說」，不一而足。它還涉及與當今中國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異同等問題，亦牽扯到中國應該回歸「新民主主義」之說。種種話題糾結在一起，至今仍在爭論之中，甚至成為熱門話題。

本文試圖從多角度來分析「新民主主義為甚麼被放棄」這一問題，其主要論點，即「新民主主義論」並非權謀之計，它本來的確有一些具體的目的；一旦這些目的實現了，執政者也就自然會提出新的目標；新的目標如果嶄新到一定的程度，那就變成了一種全新的主義，「新民主主義」自然就會被放棄；而在這中間，共產黨人的行為模式也是目標更迭的推動力之一，不能忽視。

一 「新民主主義」的提出

從字面上說，「新民主主義」是不同於舊的「民主主義」。在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中，所謂「民主主義革命」，無論新舊，在性質上均屬「資產階級革命」；與之相對，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應該是「社會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本質上雖屬於「資產階級革命」，但卻是由「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

「新民主主義」的棄取成為一件歷史公案，牽涉問題極為廣泛，從「權謀論」到「延長說」，不一而足。它還涉及與當今中國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異同等問題，亦牽扯到中國應該回歸「新民主主義」之說。

的。因此，「新民主主義」也可以說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初級階段」或「過渡性階段」，其目標是追求「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即實現「社會主義」^③。概言之，「新民主主義」不能理解為「新的民主主義」。

「新民主主義」帶有很強的階段性和過渡性質，其核心是革命領導權問題。另外，它還牽涉到其他許許多多理論和實踐上（這一點常常受到忽視）的問題。從革命意識形態的理論角度來看，「新民主主義」也並非中共獨創。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尤其是在蘇俄，類似的革命理論也存在，儘管其名號各有不同。

（一）「一次革命」與「二次革命」之間的取舍

在共產黨人所服膺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原沒有指導落後的前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眾所周知，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否則發生了也會變質。據說，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時，托洛茨基及列寧先後提出，落後國家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即共產黨）領導下發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可以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理論後來為斯大林和毛澤東進一步闡發^④，而在中國的版本就是「新民主主義論」。

當時列寧提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需要建立一個過渡性的工農民主專政，並實現社會民主工黨的最低限度綱領，而不是一下子就建立社會主義專政^⑤。他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觀點，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不能混淆，不能交錯進行^⑥，但仍主張無產階級政黨不但要在整個革命過程中掌握領導權，而且要在民主革命勝利時就奪取政權。在奪取政權這一點上，二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且不管革命是甚麼性質，政權叫甚麼名稱）。

正是這些思想，成為中國等落後國家的革命指導思想，也同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保持一致。眾所周知，只要一小批知識份子精英組織起來，對歷史進程加以干涉，就能夠加速和指導革命的轉變^⑦，這是列寧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後常被簡稱為「先鋒隊原則」，其重要性同列寧主義的其他成份（如集中主義的政黨組織原則）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換句話說，不管一國處於歷史發展的哪一階段（「前資本主義」云云），只要有這樣一批知識精英（共產黨人），都可以也應該當仁不讓地掌握革命的領導權（無論這一革命被稱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並按照一定的方向，分階段不停頓地把革命進行下去。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觀點認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必須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列寧拋棄了這種觀點：他認為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是政黨，而不是社會力量或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的變化^⑧。對列寧來說，革命者不能苦等歷史過程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革命，而是應該致力於依靠革命意志之類的「主觀因素」發揮巨大的作用，人為地加速歷史進程。列寧主義者相信，決定民族發展的是政治，不是經濟，因此，只要有意志以及能夠實現這種意志的力量，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也就是說，歷史的決定性力量不是經濟與物質條件，而是政治、信仰與意志，以及以之去改造人民的強大意識。大約因此，共產黨人也常被稱為「唯意志論」者^⑨。

「新民主主義」帶有很強的階段性和過渡性質，其核心是革命領導權問題。從革命意識形態的理論角度來看，「新民主主義」並非中共獨創。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類似的革命理論也存在，儘管其名號各有不同。

早期中共曾抱持「一次革命論」的主張。所謂「一次革命論」，即無論中國的資本主義處於多麼落後與不足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人都應該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次性推進。這一主張據說是從蘇聯傳來，以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前的列寧理論為依據^⑩。圍繞着這個問題，中共黨內曾發生長時期激烈的爭論。在「土地革命」初期，由於主張「急轉直下的進入社會主義」，中共初掌政權後，在各根據地都曾實行過近似社會主義的政策綱領。其後因不斷遭受挫敗，中共不能不改弦易轍，遂有「新民主主義論」的出台，即放棄「一次革命論」，實行革命的二階段論，又稱「二次革命論」。

但是，參照蘇聯實踐與理論間的矛盾和中共後來的行為模式，「一次革命論」在共產黨人內心深處真的被放棄了嗎？這是值得加以檢測的。

(二)「不斷革命論」

早期中共曾抱持「一次革命論」的主張。所謂「一次革命論」，即無論中國的資本主義處於多麼落後與不足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人都應該投身於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次性推進。這一主張據說是從蘇聯傳來，以俄國「十月革命」前的列寧理論為依據。

在「革命階段論」之外，馬克思主義中還有所謂「不斷革命論」。馬克思有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有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毛澤東也有他自己的「不斷革命論」。

1917年以前，列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應分為兩個階段來推進，而在不同的階段各有不同的任務，不能相混。但十月革命一旦來臨，他立即改變了觀點，採取了和托洛茨基相同的立場，恨不得讓第一個階段縮減得愈短愈好。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沒有甚麼比（能否）掌握政權來得更重要。隨着政權的取得，以及新的革命實踐的進展，一切都已不言自明：那「兩次革命」或者說革命的「兩個階段」，其實是「劃不清界限」的^⑪。

托洛茨基的說法是，俄國革命不能停留在原有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目標之上，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更不能以之束縛自己。革命不僅要最深刻地鏟除封建所有制，也要侵蝕資產階級所有制。十月革命後，列寧進一步說，在俄國當下的社會主義革命中，侵蝕資產階級所有制才是主要的革命任務，而鏟除封建所有制其實只不過是它的「副產品」，是可以「順便解決」的^⑫。

華國鋒曾經說，貫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原理，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時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⑬。因此也可以說，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更接近於托洛茨基（也是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的「不斷革命論」。

這些理論都是為着實踐而服務，並最終在「革命轉變」的實踐中發揮了作用，其深刻性恐怕也超過那些一時間顯得十分重要的（表面）「原因」。因此，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就不能就事論事，就中共論中共，也不能把眼光僅限於「事件」過程本身及「當事人」的那些言行。

(三)暴力和「過渡時期」的強制性

人們常把共產革命理解為「人民解放」、「當家作主」的運動。其實，這一點是有爭議的。

共產主義革命，同任何革命一樣，其核心特徵是暴力與強制的實施。《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在其結尾處寫道：「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⑭列寧說過，革命並不排除會有強制成份。正如生產資料社會化取代了資本主義財產權，強制勞動原則徹底和永久地取代了自由僱用原則^⑮。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曾專門論述「過渡時期的『超經濟』強制」，認為暴力和強制是「歷史的火車頭」，而所謂「過渡時期」就是利用國家權力和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社會轉變過程。布哈林特別指出，暴力和強制也適用於人民內部，是勞動人民實行自我組織和對自己實行強制的紀律的因素；不但要對非無產階級，也要對無產階級自身實行強制，包括從義務勞動制到槍斃^⑯。

(四)「新民主主義」的階段性

「新民主主義」是為了(更有利於)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就帶有強烈的階段性和過渡性。階段性是與過渡性同義而側重不同的表述。列寧認為，現在的民主革命「只是準備進到第二步的第一步」^⑰。相應地，毛澤東也有革命分「上篇」、「下篇」，早晚要「上樓」等說法^⑱。

在共產黨的語言裏，目標的規定常常不甚清晰，階段的期限也比較模糊。這連帶會引起對「過渡」的不同理解：是在一定的時期(十五至二三十年)在一定的條件具備之後再發動社會主義的「總進攻」，還是每日每時(從現在開始)都在過渡(都在建立、發展新的因素和限制、消滅舊的因素)？對此，沒有一位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家可以明確加以說明。

列寧一方面認為革命後如果不經過許多發展性的中間階段，就不能觸動資本主義的基礎^⑲，另一方面又提出「我們必須盡快地走過第一步，必須盡快地結束這一步」^⑳；後來他還明確提出了「不停頓的革命」的說法^㉑。布哈林也提出「縮短過渡時間」，促進「轉變過程」；並且強調，「超經濟」強制愈大，「耗費」愈小，時期愈短，等等^㉒。《聯共布黨史》指責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的主張，即民主主義革命要有一個五十到一百年的長久時期^㉓。事實上，十月革命以後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只實行了很短時間，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為時更短，這一點曾招致最大的批評。但「新民主主義」究竟能否依照某些人所設想的那樣「延長」下去？照此「延長」下去(比如延長十幾年時間)，又會帶來甚麼結果？卻很少有人考慮。

「新民主主義」是為了(更有利於)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自然就帶有強烈的階段性和過渡性。階段性是與過渡性同義而側重不同的表述。列寧認為，現在的民主革命「只是準備進到第二步的第一步」。相應地，毛澤東也有革命分「上篇」、「下篇」，早晚要「上樓」等說法。

二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歷史評價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義論」的提出，常常被視為一種「權謀」或「策略」。有西方學者在對斯大林的研究中指出，蘇聯黨總是不把政策和策略當作原則問題，而是當作權宜之計，其目標是爭取群眾的支持^㉔。俄國在革命勝利後立即實行「軍事共產主義」，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退回到「新經濟政策」，

而後者也僅僅實行了幾年就被取消了。近年有俄羅斯學者對「新經濟政策」和列寧晚年思想進行了研究，也認為前者只不過是某種策略和計謀，用以「欺騙聾啞人」^⑤。就中國來說，針對「新民主主義」，也有類似的質疑思路。

那麼，「新民主主義」究竟是一種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現實需要，還是一種「策略性」的權謀？

「新民主主義」的現實性可能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當共產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不能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並有必要取得國際國內各派人士的認可之時，在其掌控下的地區，在政策上的選擇捨「新民主主義」別無其他；其二，當缺乏一些必備的條件而不能開展社會主義改造時，也需要這麼一個階段，以便積蓄力量，改變局面，創造機會，做好準備。其實，「權謀」有時也可視為一種現實的需要。

總而言之，不管人們是否愈來愈認同「權謀論」，「新民主主義」也有其客觀存在的需要，否則很難想像中共如何爭取人心和取得國內戰爭的勝利，同時，根據地(老區)的社會經濟政策也將是一片空白。特別是中共在取得全國政權以後，基於現實的考慮，也有必要劃出一個階段，為進入下一階段做出必不可少的準備。但是這一階段的任務，相對於「社會主義改造」來說，究竟是甚麼呢？對此，中共在當時一直缺乏清楚的交代。這對當時的行動方略或許不無益處，但卻因此留下了一件歷史公案。

我們從事後觀察(並參考民國時期南京政府的有關經驗)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的歷史任務就是：穩定全國財政、金融和物價，以及實現對經濟的有力控制，即所謂掌握「國家經濟命脈」。沒有這一點，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無從展開(這也是老區多次類似試驗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做到這點，「新民主主義」的使命也就宣告完成，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歷史邏輯。

說到「新民主主義」階段與後來的「社會主義」時期的異同，還應注意，共產黨人在所謂「新民主主義」時期，實行的仍是共產黨那套辦法，而不是其他思路。例如，共產黨人不相信乃至排斥市場的作用，因之「新民主主義論」中最「薄弱」的一環就是有關市場的理論；共產黨人特別青睞「統制經濟」方法的持續運用，這具體表現在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在建國初期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對工商業各方面施加全面的控制。

有趣的是，中共將現在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發展定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乍看起來，「新民主主義」與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如多種經濟成份的並存等。所以，有很多人認為現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正是當日的「新民主主義」。其實，二者之間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兩個方向相反的運動：前者在目標上是朝向(傳統)社會主義的，後者則是剛從傳統社會主義解脫出來；前者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後者則未必是；前者極度強調和強化政府在國家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後者則向反方向運作。

此外，「新民主主義」實行於工業化的初期，目標是完成工業化；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則是已完成了初期資本聚積(即所謂「原始積累」)，經濟由所謂「供

「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方向相反的運動：前者在目標上朝向(傳統)社會主義，後者則是剛從傳統社會主義解脫出來；前者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後者則未必是；前者極度強調和強化政府在國家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後者則向反方向運作。

給不足」轉向「需求不足」，非由「產方」(政府)決定而改由「消費者」以鈔票來「投票」的階段。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較高階段；反之，我們卻不難將「新民主主義」稱為一種發展的「初級階段」。

今日的「初級階段」，若任其長期延續下去，也不大可能回歸傳統社會主義，更不可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至於說究竟會走向何處，本文限於篇幅，難以詳述。但是，當日的「新民主主義」，即便能持續一段時間，也勢必與黨的基本教義發生衝突(如對市場的認識即是很難通過的一關)，也會因「統制經濟」的進一步實施(這是它唯一擅長的手段)而不免產生各種「經濟危機」或「供求危機」(就像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那樣，不斷地製造危機，再代之以新的危機)。因此，「新民主主義」勢必會引發「社會主義改造」。

三 促成「革命轉變」的諸因素

除了共產黨意識形態內在的邏輯促動之外，促進「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現實因素也很多。我們將之劃分為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分別加以考察。

(一) 國際因素

中國自十八世紀以來，已與世界歷史漸次打成一片^②。到二十世紀，更不能不受國際因素的特別影響。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對於當時國際間的兩大陣營，中共選擇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做法，其原因可能包括：(1) 中共與蘇共及共產國際的歷史關聯；(2) 地緣政治的考慮，這既有尋求國際支持的一面，也有便於解決中國北部邊疆問題的一面；(3) 國內鬥爭的考慮，國民黨既然採取親美立場(和事實上獲得美國的支持)，作為其對立面的共產黨自然只能採取反美和親蘇的態度；(4) 中蘇兩黨間的其他親緣關係，例如意識形態的一致、社會目標追求及其手段的一致、一黨專政的組織模式及運作方式的一致，等等。這使中共不僅在外交上，也在內政上不能不親近蘇聯和向蘇聯學習。

這樣，在兩大陣營之間，中共終於選擇了「一邊倒」，而排除了其他可能。毛澤東後來曾表示，有人懷疑「一邊倒」這個方針，認為可以採取中間路線的地位，站在蘇聯和美國之間，也就是南斯拉夫的辦法，即兩邊拿錢，這邊也拿，那邊也拿。毛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這種騎牆的策略根本就是一廂情願^③。因此，「一邊倒」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種「選擇」。參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陣營的日益強盛、新的國際戰略的制訂、中共與蘇聯的緊密關係，以及中共的人員構成，也可以說從來就是「一邊倒」的，以後發生的不過是一種「自然而然」而已。

當然，和共產國際中大多數國家的情況相似，中蘇兩黨間一向存有不少芥蒂，特別是毛澤東執掌大權以來，甚至有斯大林不知毛為何許人之說。毛亦曾

當日的「新民主主義」即便能持續一段時間，也勢必與黨的基本教義發生衝突(如對市場的認識即是很難通過的一關)，也會因「統制經濟」的進一步實施而不免產生各種「經濟危機」或「供求危機」。因此，「新民主主義」勢必會引發「社會主義改造」。

指責蘇聯：革命時不支持我們，勝利後反懷疑我們是「鐵托第二」^⑳。因此，剛一建國毛即專訪蘇聯，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據說，只是到抗美援朝，毛才獲得斯大林的信任^㉑。待制訂五年計劃和過渡時期總路線時，毛再次向蘇聯「保證中國向社會主義前途邁進」，表示一定實現諾言^㉒。1953年初，據說劉少奇從莫斯科帶回了斯大林要求中國結束「新民主主義」的意旨^㉓。

其實，抗戰期間，中共與美國之間也曾建立了一定的關係。毛曾多次會見美國友人，表示戰後建設離不開美國援助（戰爭期間美國對華援助高達38億美元以上）^㉔。1949年中共宣布「一邊倒」後，美國使館仍堅持最後一個撤出大陸。隨後，兩者間的談判也沒有終止。1950年中國抗美援朝，終使中美雙方成為戰場上的對手，不可改變地決定了中美關係的惡化。其結果是，中共不可能從西方國家得到它亟需的大筆貸款^㉕，而其後從蘇聯獲得的援助和貸款也少得可憐^㉖，因此不得不放慢建設步伐並選擇新的國家發展戰略。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只能走蘇聯軍事一重工優先的建設道路，並把發展軍工和準備打仗作為首要的戰略目標。這一發展戰略也深刻地影響了國內政治經濟。

1950年中國抗美援朝決定了中美關係的惡化。其結果是，中共不可能從西方國家得到它亟需的大筆貸款，而其後從蘇聯獲得的援助和貸款也少得可憐。中國只能走蘇聯軍事一重工優先的建設道路，並把發展軍工和準備打仗作為首要的戰略目標。

打破國外敵對勢力的包圍，曾是蘇聯加速工業化和強制集體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國可能也有相同之處。中共始終處於戰爭環境之中，並最終依靠武力奪取了政權，這是它自身具有的軍事傳統。奪取全國政權以後，似乎進入了和平建設時期，然而軍事作戰不但沒有中止反而被延續了。1950年大陸上的戰鬥基本結束，但中共仍在準備對合作戰；隨後，中共還派軍事顧問團進入越南。當然，最為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終於介入了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的爆發固然是一個「外來因素」，但中國的介入顯然存在着國際共運和中共兩方面的「主觀因素」：一方面，是出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考慮和打算等。1947年，蘇聯制訂了國際共運「放手大幹」的新路線；1949年強調中國例子的重要性，並准許中共在東南亞承擔領導責任（當年11月即在北京召開了亞澳國家工會會議）^㉗。另一方面，中共也有着自己的戰爭觀和傳統的「天朝大國」思想。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進入了一個「戰爭間歇」時期，但中國仍加緊戰備和軍工建設，例如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期間將軍工和軍工作為優先發展項目，要做「世界兵工廠」，同時反對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提出的「和平共處」等。這些都不能簡單地說是「被帝國主義逼出來的」^㉘。

當然，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也受到中朝雙方在歷史上密切關係的影響。據已公開的蘇聯檔案披露，1950年初金日成曾幾次訪華，在5月15日的會談中，毛澤東答應：一旦美軍參戰，中國將派兵幫助朝鮮。毛並說明：因為蘇聯與美國曾就三八線分界有約定，所以不可直接參戰，但中國沒有這種義務^㉙。

1950年6月北朝鮮發動預料中的進攻，意外的是隨後的敗績和美國的干預（並宣布台灣海峽中立），打亂了各方原有的部署。10月，中共考慮出兵，想法中既有被動的一面，也有主動的一面：

其一，處於國際共運的新戰略及進攻態勢與美國的遏制政策之間，中美之戰早晚不可避免（事後來看，先有朝鮮，後來又有越南）。

其二，毛認為，只要有蘇聯做後盾，只要美國不扔原子彈，這場戰爭就能打贏（過去美國的有限援華政策不能使他得出美國有力量和有決心的印象，遂有對美藐視之感和「紙老虎」之說）。

其三，在斯大林面前「露一手」，以重獲中國在朝的傳統地位。

通過抗美援朝，中共雖取得了原來蘇聯在朝的地位，但歷次戰役中國仍向斯大林匯報，停戰與否亦取決於斯大林。據說斯大林若沒有去世，未必能停戰^⑧。

結果，朝鮮戰爭使中共全面倒向蘇聯，切斷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加強和延續了自身的軍事傳統，使戰爭和備戰成為以後相當一個時期突出的戰略考慮。這自然要延及到內政。

(二) 國內因素

共產黨雖最重視政權的奪取，但它不僅僅是為奪權而奪權，其目的和願景也不能離開對社會的改造。對此，中共信奉的是：在一個強有力的集權的中央領導之下，對整個社會實行全面徹底的控制、改造和管理。這一革命理想被概稱為「社會主義」，其主要特徵是：在經濟組織上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對經濟運營實行政府計劃之下的直接管理；在社會中取消民間組織及其活動領域，把一切納入政府組織及其有效的管制之下。

1953年，中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目標是「一化三改造」，即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的合作化是其中首要的目標，它於1955年達到高潮，於1956年全面實現。

但合作化運動並不是這時才「開始」的。1950年全國土地政策確定之後，毛澤東即把眼光轉向了「其後」的問題，如插手有關東北富農問題的爭論（1950年）、山西發展農業互助合作社問題的爭論（1951年）、第一個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的制訂等（1951年底）。同期東北和華北的合作化運動都出現了所謂「冒進」的現象。毛所關心的是土地改革以後農村陣地的丟失、原有貧農積極份子的去向、新建基層組織的維繫等有關農村（社會主義）前途的問題，因而主張及早動手，「乘熱打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毛在這期間執著於實現《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農業產業軍」的原教旨主義思想^⑨。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提前開始」，為「革命轉變」的決策做出了準備，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它的全面展開和其後的加速發展。

工業和農業方面的情況有着類似之處。私營工業早已處於「利用、限制、改造」之中，貸款仰仗政府銀行，生產安排、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也都要依賴政府（「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私營企業表面看來還是獨立的工商企業，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個事事仰賴政府的「加工車間」。這是農業和其他方面遠未能做到的；也決定了以後它不必像農村那樣掀起軒然大波，而只需等待時機，「瓜熟蒂落」。儘管工業國有化的過程中有小的波瀾，即「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方式一時間沒有確定下來，但到1953年夏，工業領域中的「公私合營」改造方案終於得到認可，而商業方面的改造實際更早就開始了。事實上，工業國有化在1956年一舉實現。

毛關心土地改革以後農村陣地的丟失、原有貧農積極份子的去向、新建基層組織的維繫等有關農村（社會主義）前途的問題，因而主張及早動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提前開始」，為「革命轉變」的決策做出了準備。

共產黨人信奉「計劃經濟」，這與它的集權與國家主義（政府崇拜）傾向是一致的。按照原有的工作安排，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之後的1953年要開始「一五」計劃的實施，包括大規模引進的蘇聯援建項目的安排上馬，這就提出了立即進入計劃經濟時代的問題。

當時不但在工業領域存在很深的政府干預，農業方面也有相應的指標控制（如反「五多」等）。這可概稱為「統制經濟」，而恢復時期的各項經濟成就多是靠它取得的。面對這樣的局面，共產黨人自然會有進一步的疑慮：仍屬私人所有的工商企業以及個體的農業，能否那麼順從地服從政府的領導，實現全國的一體化、一盤棋？於是，計劃體制即將全面實施，很可能也是推動「社會主義改造」開展的考慮之一。

實現工業化是共產黨的一大雄心，也是所有（落後）國家所面臨的一項歷史性任務。在中共早先提出的「三年準備，十年建設」規劃中，即包含有工業建設的內容，但它仍屬於「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是為將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做準備的。但到1953年中共宣布了「總路線」，工業化自然與「三大改造」一起出台。

問題還不僅在此，1953年提出的目標是十五年實現工業化（大約參考了蘇聯的經驗），未免太急進了些，這說明中共對工業化的艱難性還沒有足夠的認識。「總路線」的重心似乎也不在工業化（經濟），而在「三大改造」（政治）之上。很顯然，在當時，中共恐怕也沒有充分考慮到它會連帶引起的問題（如「統購統銷」的突發），以及重工業優先模式將會帶來的弊病（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討論的那些）。

1953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有許多因素都湊在一起。在中共原有的工作規劃中，這一年本是一個分界點，規定着舊階段的結束和新階段的開始。1950年代初中共曾提出要有一個三年為期的階段：1950年毛澤東提出用三年（或更多一點）時間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1951年中共提出「三年準備，十年建設」，並稱之為黨的「總計劃」（劉少奇語）和「總方針」（周恩來語）；毛當時說：從現在起，還有二十二個月^④。

從1950年初到1952年底這三年時間裏，中共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這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實現經濟恢復、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達成國家的空前統一和中央權力的高度集中，等等。因此，到1952年下半年「三反」、「五反」結束之後，中共自然就得以集中全力考慮下一個「階段」的問題，並因為前述的種種原因，終於推出了「總路線」——一個與前頗為不同的新的規劃，順手解決了「革命轉變」的問題。

四 終結「新民主主義」：共產黨人的行為模式

共產黨的原型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政黨組織，其目標就是掌握政權，然後按照某種理想和方案，急切地對社會經濟進行大刀闊斧的、甚至是徹底的改造，基本上不計較其革命理想和實施方案是否「現實」，以及社會尚處於怎樣的「歷史發展階段」，哪怕是「揠苗助長」和使用革命、暴力、專政等手段，也要一意貫徹自己的意志，迅速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在中共原有的工作規劃中，1953年本是一個分界點，規定着舊階段的結束和新階段的開始。到1952年「三反」、「五反」結束之後，中共自然集中全力考慮下一個「階段」的問題，終於推出了「總路線」——一個與前頗為不同的新的規劃，順手解決了「革命轉變」的問題。

因此，共產黨這種革命組織本質上就是激進的：一旦出現某種機會，就會不遺餘力地把事態推進一步；即便在條件「不夠」之時，也要創造條件，製造種種機會（毛的「過渡」、「過橋」之說就應這樣理解）來推進「革命」^④。這種狀況既影響了黨內的權力鬥爭；反過來，黨內的尖銳鬥爭也會影響政策趨向「左」，趨向「強硬」和「極端化」。

共產黨人重行動，說它是實用主義也罷，機會主義也罷^⑤，在其遠大目標之前，一切都是過渡的。在1953年，「新民主主義」是「過渡」；到1958年，「社會主義」也成了「過渡」，都成為不間斷的運動過程，目標都是大踏步邁向共產主義。在這中間，行動是最重要的，「幹，決定一切」^⑥。在1953年前後，給我們印象最深的，就是這種「得出手就出手」、「得跨越就跨越」，「行動第一」的行為方式。

對於一個黨來說，綱領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綱領在共產黨人行動中究竟佔有何等地位？這也是一個很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有人認為，「中共的綱領是不確定的」，這「證明中共不大像一個為實現特定綱領而成立的志同道合的黨」；「實施綱領不是中共的目的」，「政權才是中共的目的」，這「是它綱領背後的綱領，……目的之中的目的」^⑦。

共產黨的最大特點之一，固然是追求權力、壟斷權力和運用權力（首先是政權）。這本來是（實現社會理想的）一個手段，漸漸手段異化為目的，一切政策措施幾乎都視其進退而進退。只要政權到手，一切都不在話下，「打江山」時的這種心態就是一個質樸的表達；它也表明，實現理想和社會改造的槓桿，仍是權力（包括政權及各方面的權力）。迷信權力、控制力或力量，幾乎可以解釋共產黨的一切行為，或視為其行動的另一條主線^⑧。「依實力對比關係以及其他不可預先確切判定的因素為轉移」和「依照我們的力量為標準」，本身就是列寧的堅決主張^⑨。共產黨人這種完全從力量對比出發的行為方式，常常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⑩。他們很少注重諸如歷史階段、社會結構、經濟規律等因素的作用。因此，共產黨往往表現出「唯意志論」、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及「雅各賓主義」（Jacobinism）的種種特點^⑪。

所以，一旦擁有力量，奪取、把握、控制或壟斷了權力（從政權到經濟領域的全面權力），其他則指日可待，政策就必然會跨進一大步；或反過來，中共政策的變化只是為了進一步獲得力量和控制權力。1953年就是這樣——再也沒有任何對立的挑戰性權力和力量存在了，從政治到經濟到社會。「三大改造」就此展開。

這樣我們就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及的一個問題：共產黨人是「唯意志論」者麼？這裏我們也許可以回答：並不是簡單的「唯意志論」，也不是其他甚麼「客觀規律」，而是力量的變化或權力的強弱^⑫，決定了政策及其轉變和所謂的「不斷革命」。或者也可以說，共產黨人是把大家的「服從」和所謂「一致擁護」，來代替了「客觀規律」。

以上所說，與其說是甚麼「理論解答」，毋寧說是一個「性格分析」。它們組合起來，就可能構成一種行為方式的解釋，也是一種對「歷史當事人」的實際考慮的考察。

共產黨人是「唯意志論」者麼？我們也許可以回答：並不是簡單的「唯意志論」，也不是其他甚麼「客觀規律」，而是力量的變化或權力的強弱，決定了政策及其轉變和所謂的「不斷革命」。共產黨人是把大家的「服從」和所謂「一致擁護」，來代替了「客觀規律」。

註釋

-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213。
- ② 毛澤東：〈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1953年8月），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301。
- ③ 參見高王凌：〈新民主主義中有沒有民主的概念〉，《炎黃春秋》，2012年第4期，頁31-32。
- ④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譯：《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頁98。
- ⑤②④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48），頁95；97；95、97。
- ⑥⑩⑪⑫ 鄭超麟著，范用編：《鄭超麟回憶錄》，下冊（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541；619、474；628；540、543。
- ⑦ 湯森(James R. Townsend)、沃馬克(Brantly Womack)著，顧速、董方譯：《中國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頁59。
- ⑧⑨⑬⑭ Allan Bullock〔布洛克〕著，鍾宜審定：《希特勒與斯大林》，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56、199；32、301、334；109；165。
- ⑬ 華國鋒：《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7），頁4。
- ⑭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285。
- ⑮⑯ 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著，余大章、鄭異凡譯：《過渡時期經濟學：第一部分，轉化過程的一般理論》（北京：三聯書店，1981），頁118-28；119-21。
- ⑰⑱⑲⑳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531；547；532；550。
- ⑳ 1940年3月毛澤東在邊區黨政聯席大會上的講話。參見石仲泉：《毛澤東的艱辛開拓》（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頁115。
- ㉑ 參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 ㉒ 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y)著，李惠生等譯：《斯大林秘聞：原蘇聯秘密檔案最新披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頁229-30。
- ㉓ 高王凌：《乾隆十三年》（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頁168。
- ㉔ 1956年10月8日毛澤東在工商聯部分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文化大革命期間清華大學紅衛兵編輯印行的非正式出版物）。
- ㉕ 參見高王凌：〈農村集體化的歷史反思〉，未刊文稿。此外，如王凡西說，毛澤東早已是未有鐵托(Josip B. Tito)之前的鐵托了，另一位托派份子鄭超麟說，中共一向有鐵托主義。參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291。
- ㉖ 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說：「蘇聯……對我們，搞父子關係、貓鼠關係，「我們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說是假的，我們不辯護。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參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177、175。
- ㉗⑳ 高王凌：〈農村集體化的歷史反思〉，未刊文稿。
- ㉙ 王明著，徐小英等譯：《中共50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137-38。
- ㉚ 1949年6月，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曾託北上的陳銘樞向中共轉達如下意向：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借給新政府50億美元。參見于化民：〈新中國成立前夕美國與我方的秘密接觸(續)〉，《百年潮》，2001年12月號，頁31。
- ㉛ 蘇聯貸款的最大部分，是用來從蘇聯購進軍事物資的。其中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於抗美援朝戰爭之中。而據司徒雷登提供的數字，蘇聯在中國東北拆走的工業設備即「價值20億美元」。參見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450、176。
- ㉜ 鄒讜著，王寧、周先進譯：《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486-87。

- ⑳ 黃仁宇說：「蘇聯與中國的革命，……仍不外是過渡期間的體制，主要的目的是以戰時的姿態存積資本。……在使全民動員，強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資的全面社會化，高速地使蘇聯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包涵着三個重點，一、不惜人民付出代價，二、飛速完成，三、與國防密切聯繫。」參見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289、449。
- ㉑ 參見清源：〈韓戰秘密檔案的公開〉，《明報月刊》，1994年第9期，頁38。另外，據說在東北內戰期間金日成向人民解放軍提供了大量的作戰物資和名義為「自願隊」的北韓部隊。這種戰略後方基地及安全庇護所的作用，在日後抗美援朝的決定中當起過重大的影響。參見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66。另一方面，有消息說，在1950年6月開戰以前，早就有朝鮮族的中國部隊派駐朝鮮了。參見劉力群的個人談話（北京發展戰略研究所，1994）；〈紀坡民說「抗美援朝」〉（2011年8月3日），www.haijiangzx.com/html/print/2578_t1.html。
- ㉒ 據說，朝鮮停戰的達成有兩個因素，一是斯大林去世，一是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捎給北京一個訊息——如果朝鮮戰事不停止，他將批准動用核武器，並把戰爭擴張到中國大陸。參見《台灣現代化的推手》，頁235。
- ㉓ 參見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劉之爭的一個解讀〉，《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頁10-12。
- ㉔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09。
- ㉕ 黃仁宇說：「〔列寧〕的宇宙觀有一個『目的論』（teleological）的布局。……感覺到只要目的純正，可不論手段。而且……行動非常實際。」（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頁424。）王景倫認為：「他們〔共產黨領導人〕的實用主義是基於對局勢的應變和對實際需求的判斷。」（王景倫：《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美國學者論中國》（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頁108。）
- ㉖ 如孫平即將其稱之為「如果有機會，就幹」的「真正的機會主義哲學」。參見弗拉基米洛夫（Petr P. Vladimirov〔孫平〕）著，呂文鏡等譯：《延安日記》（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259、537。
- ㉗ 如王凡西說，中共對實幹的過份強調，幹決定一切的觀念，有悖於列寧「理論乃行動的指導」的思想，它造成狹隘、短淺的目光，經驗主義、常識主義的作風，官僚的、命令的與行政事務主義的思想；結果永遠受着策略性的政客手段的驅使，卻不能堅持原則性的方向。參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頁116。
- ㉘ 參見鮑彤：〈透視中共——為中共八十年作〉，<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221985.html>；孫平也說，中共沒有「明確一致的行動綱領」。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329。
- ㉙ 如王景倫認為，政治領先，政治鬥爭是經濟鬥爭、社會鬥爭的關鍵所在（王景倫：《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頁285）；孫平指出，毛所全神貫注和熱切希望的，只是權力！這是他的終極政治信條（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357）；錢穆的說法是，此即（西方的）「尚權政治」（錢穆：《晚學盲言》，上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6）。
- ㉚ 薄一波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凡一項工作任務的提出，工作部署的輕重緩急，總是同對現實形勢的分析和一定的估量相聯繫的。」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370。
- ㉛ 康有為說：「人事之義，強弱而已矣。」引自蕭公權著，汪榮祖譯：《近代中國與新世界：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頁377；孫平說：「實力，這是他〔毛〕的政策的主要立足點。」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頁342。